

五、朝鲜停战和解除占领

——从景气消失到经济危机

1. 背景

从1951年3月起，日本经济的朝鲜景气开始消失。马立克的停战方案是在6月份提出来的，日本经济从此时开始转入下降，到重新回升为止，大约经历了三年半时间。简单地说，这一期间的景气内幕已经暴露出来了。在这内幕里有非常复杂的动态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内幕的背后又有国内外重大的政治背景。这里，先就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背景作一简单的介绍。

美国在占领初期即公开声明，对日本的占领时间将于短期内结束。尽管如此说过，实际上占领时间大大延长了，但是朝鲜战争一爆发，所谓“自由世界的国家”便急于单独对日缔结和约，因此旧金山和约宣布成立，并于1952年4月生效，从此美国也就大体上解除了对日本的占领。不幸，这是一个被歪曲了的和约，不是全面媾和而是片面媾和的和约。美军原封不动地继续驻扎在日本，日本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这是以“旧金山体制”来代替美军的占领体制。一直处于占领状态下的日本经济，正是依靠占领体制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用说，这种变化与完全的独立经济是有区别的。

美国与南朝鲜不仅顽固地阻止朝鲜战争停下来，而且企图扩大这场战争。尽管如此，朝鲜战争还是在1953年7月停下来了。后来的印度支那战争也是这样，是由于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危险，在要求世界和平的强大声势下停止的。美国与北朝鲜终于在1954年7月达成了停战协议，一个很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从地球上消失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冷战告终，更不是美国的反共军事体制有任何缓和。随着战争逐渐消停，和平空气不断加强，对于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日本经济不能不发生一定影响。

日本垄断资本既采取加强对美依赖的方针，又谋求部分地从占领的体制下解脱出来；从加强对美国的依赖中，谋求打破朝鲜停战后的困难局面，取得经济的大发展。虽然这种企图使日本工业生产在1953年取得了迅速增长，但日本经济很快又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这种大幅度的上下波动，曾使人们陷于苦闷和焦虑之中。然而很快出现的景气回升，又使日本经济获得了一个划时期的新发展。

2. 景气消失后的变化

朝鲜战争景气消失后，日本经济因受到接踵而来的各种重要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

从1951年春起，纤维和钢铁等的价格已从高点向下跌落，一般地说，这是景气开始消失的象征，但是工业生产仍在增加。前面已经提到，景气趋于停滞而工业生产还继续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特需仍在发挥作用；从1950年末到1951年初这段景气时期所取得的巨大利润，大部分都用于设备投资，而这些新设备又是比较早地投入了生产；此外为降低成本也增加了生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种倾向，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库存的增加，因此入夏以后重新趋于上涨的物价又开始下跌。在过剩产品还没有消散的情况下，继续提供大量的库存信贷，这也是支持生产增加的一个有力因素。尽管如此，到1951年底，一些主要部门

的生产增势开始停止，加以当时国外的需求减少，出口不振，市场行情普遍恶化，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商品价格后来大幅度地下跌了。

从1952年后半年开始，工矿业设备投资的增势与上年相比已经明显减退，出口也陷入停滞状态。但是由于扩大消费的政策发生了作用，国内的消费需求反而大幅度地增加，因而与工矿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以及面向出口的消费资料生产都陷入停滞的情况相反，面向国内消费资料生产大量地增加了。因此整个地说生产还是扩大的，增加的幅度为上年的二分之一或者是前年的三分之一。物价因商品不同而涨跌有异，但整个地说是平稳的或略趋于下跌。

比较地说，这时国内物价水平仍略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因此进口商品利润很大，使进口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1952年度后，由于采取扩大国内购买力的政策，进口进一步扩大。相反地，因国内价格较高而出口比较困难，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到1953年便放弃了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采取降低利息、促进融资等积极的金融政策，结果使投资和消费需求迅速地扩大起来，因而工业生产又有了急剧的增加。根据企划厅的生产指数来看，1953年比上一年增加了24%。由于同样的原因，进口也增加了，1953年进口额比上年增加近四亿美元，但出口完全没有增加，所以贸易赤字在1952年为七亿五千万美元，到1953年超过了十一亿美元。特需（广义的）收入虽然在1952年已达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的最高纪录，但1953年即减为八亿零九百万美元。因此包括特需在内的外汇收支出现出超，最终只有把手中的外汇全部用光。

朝鲜战争爆发时日本的外汇储备只有三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其后由于有大量的特需收入，外汇储备不断地大幅度增加，到1952年末达十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一度几达十二亿美元。但到1953年

年中，由于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储备大幅度减少，到1953年末已减至九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外汇储备降到十亿以下。外汇储备的减少趋势到1954年初仍未停止，这年5月末已减至七亿八千万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固定债权，实际上外汇储备只有五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对当时的贸易来说连最低需要也难以保证。巨额的滞货贷款和救济贷款，充分表明政府企图维持景气和扩大产业基础的政策已经失灵了。

1953年9月，日本中央银行已不得不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朝鲜战争以来，日本经济以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速度急剧发展，特别是1953年，由于采取扩大国内市场的政策，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但是1953年秋，由于美国景气趋于恶化，对美国依赖关系较强的日本经济，也不得不停止其过份扩大的倾向。

为避免朝鲜停战减少特需所带来的困难，此时政府和垄断资本按照美国的要求，采取了与美国缔结MSA协定（相互保障安全协定）的方针，以便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但是美国对于缔结MSA协定的国家有许多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稳定货币和平衡财政收支，当时对日本也强烈地要求做到这一点。于是日本中央银行从10月开始进一步紧缩银根。由于这一阶段的紧缩政策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勉强采取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委，经济企划厅编的《战后经济史》上也有记述（参阅此书“经济政策篇”，第335、342页）。

不久世界银行调查团来日，该团在12月份劝告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对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迫近年末的时候，吉田首相便突然指示削减预算，将1954年度的预算削减10%，接着在内阁会议上又决定坚决将预算压缩在一万亿日元以内。就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吉田首相传达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通过日本驻美大使传来的编制

紧缩预算的要求。

为贯彻执行紧缩政策，1953年度的国家预算规模包括一般会计和补充会计在内共为一万二千余亿日元，1954年度的预算规模又进一步削减到九千九百九十五亿日元。这一年取消了任何新建项目，所以财政投资比上年度大幅度削减约20%。这样一来，该年度内物价下降了5—10%，国际收入也恢复了平衡，影响很大。1954年3月又削减了外汇预算，因而进口规模也缩小了10%。

由于彻底推行紧缩政策，景气趋于恶化，工矿业生产从1954年3月开始减少，一直到9月都处于疲弱状态。在银根吃紧的影响下，破产的公司增加，许多企业进行合并，失业人数迅速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资金需求减少，物价开始下跌，通货膨胀有所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4年夏季以后。

3. 垄断的对策

日本垄断资本依靠朝鲜战争取得了暴利，进行了巨额的资本积累，但是战争景气很快便消失，因为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迅速开始了。这时的世界景气也在消减，但是日本物价从战争景气时开始上涨以来，一直高于其它国家，这在出口竞争上难免处于不利地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垄断资本不仅力量不足而且在许多方面都非常落后，因此，尽管在朝鲜战争初期资本急剧积累，本身也得到发展，但是还很不成熟，加上战争停止后的特需前景暗淡，它深感不安。

这时，道奇路线推行以来所采取的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针，已经成为发展的障碍。制订1952年度的补充修正预算时，正当和约生效之后，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可不受占领军司令部监督的编制预算的机会，于是政府和执政党开始对平衡预算的方针进行了若干修改。到编制1953年度预算时，便明确地抛弃了财政收支综合平

衡的方针，积极推行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

这个预算方案的说明书制定于1953年6月，正当停战协定缔结之际，这是最能表明当时政府和垄断资本的观点的文件，所以摘录一段如下：

“最近朝鲜停战已经实现，我国必须尽快确立摆脱特需的经济独立态势。为此，首先必须充实和加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的合理化和效率化，纠正国内物价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以牢固的经济态势自立于国际经济之林。在目前的状况下，财政的作用极为重要，必须积极扩大财政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并奠定经济基础，特别要充实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国内的自给能力。……”

“但是从最近的财政金融形势来看，再固执地抄袭过去那种财政收支综合平衡的方式，已无必要，相反地，应当灵活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进行财政投资。”

日本正在开始准备积极发展的时候，国外景气恶化，国内生产过剩，特需削减，种种令人担忧的因素接踵而来。上面摘引的一段话，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企图打开一条出路的焦躁心理的表现。“政府的想法是……在朝鲜停战后的形势下，如果不及早摆脱对特需的依赖，日本经济就将落后于国际经济。从这种焦虑和迫切的愿望出发，遂不惜冒通货膨胀的危险，扩大经济规模”（经济企划厅编《战后经济史》总观篇，第439页）。该书又写道：“政府是在继续维持特需收入的基础上力图扩大出口以加强产业基础，然后再从依靠特需这个外在的支柱下摆脱出来，以达到经济真正独立的目的”（第43页）。也就是说，政府和垄断资本的真正目的是在未来建成独立的经济，当时就是要继续维持相当规模的特需，也就是一边依赖和利用特需，一边推行扩大经济的政策。这是一种如意算盘，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种所谓积极、独立的政策，实际上仍旧充分表现了政府和垄断资本依赖美国的根深蒂固的本性。

战后，一直到执行道奇路线时为止，从未正式进行的生产合理

化工作，到此时才正式地开始了。当时对合理化或现代化的设备投资，虽然不能与1956年以后的情况相比，但也毕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合理化、现代化以及积极进行设备投资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垄断资本依靠获取的巨额利润积极地进行了资本积累（特别是1951年和1953年）；特需和增加出口扩大了外汇的收入，因而有可能进口新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民间银行积极发放设备资金贷款（特别是1950年和1952年）；通过美援物资的回头资金特别会计和开发银行（建立于1951年5月）为设备现代化提供资金；积极提供财政投资（特别是1952年和1953年）等等，可以举出许多。特别是1951年修改了租税特别措施法，按照新法规定，凡属现代化设备可以大幅度地提取特别折旧费。1952年制定的包括同样内容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以及1950年制定的“外资法”等，都为引进新技术和伴随技术引进而来的资本引进开辟了道路，尽管其中还有种种问题，但它们都是特别重要的立法。

于是，各种合理化计划陆续出现，如从1951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钢铁合理化计划，1952年开始执行的棉纺合理化计划，1953年开始执行的合成纤维五年发展计划，1954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硫酸铵合理化计划和水泥三年合理化计划。在第一个钢铁合理化计划中，从1951年到1955年间，以压延部门为中心的投资总额高达一千三百亿日元，这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合理化措施。

合理化的内容包括从企业合理化逐渐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合理化。从这个观点出发，如何整顿产业组织和完善建厂条件等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整顿产业组织方面，由于生产过剩和竞争激化，组织卡特尔成了中心问题。1949年9月在煤炭部门曾经有过有关价格的自主卡特尔（当时是地下的），在朝鲜景气消失、出现生产过剩之际，又相继出现了以限制生产为目的的卡特尔。1951年夏季首先在人造纤维部门出现了地下卡特尔的活动，

1952年1月在棉纺部门出现了自动缩短生产时间的地下卡特尔，烧碱部门也在此时开始缩短生产时间。为了避开禁止垄断法而使卡特尔合法化，还以劝告形式劝说缩短生产时间，因此从1952年3月起在棉纺和人造纤维部门连续出现“劝告缩小生产”的情况。

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资本集中倾向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突出地表现为企业联合，即旧财阀系统多数商社的联合，特别是三菱商事的复活（1954年）以及晚些时候三井物产系统的联合（三井物产复活于1959年），1952年以纺织工业危机为契机，各部门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进行的系列化和银行信贷的系列化也有了显著的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是热望废除或者大幅度缓和禁止垄断法的，所以在该法公布二年后的1949年，即将限制过严的条文作了若干缓和性的修改，但是未做更多的变更，这是因为当时还处于被占领状态，不得不遵循美方的方针，不做大改。后来随着和约的签署，被占领状态接近结束，日本政府才提出了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方案，但是美国政府发表了不予承认的通告。日本政府深感意外，暂且打消了修改的念头，一直等到解除占领的1953年8月，才大幅度地修改了禁止垄断法（第二次修改），允许“萧条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存在。这样，在这以前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地下卡特尔和受到劝告而缩短生产时间的那些垄断组织的主要内容，在修改后的禁止垄断法中便都被去掉了。对比之下，过去的地下卡特尔组织还是比较先进的东西了。

一般地说，在这一时期，随着占领的解除和资本积累，资本集中与垄断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

4. 随着解除占领而发生的变化

美国为重建其占领下的日本资本主义，从改变对日政策以后，

便急于培育和加强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美国在日本采取间接统制的方式，即在服从占领政策的前提下，由日本政府承担实施政策的责任。基于这种关系，不论在占领初期还是朝鲜战争之际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日本垄断资本都没有做过不利于占领政策的事情。在其它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在经济方面，在占领中它便形成了依赖、从属于美国的态势，在这个基础上缔结的媾和条约、安保条约和行政协定，更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1953年又缔结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在形式上采取了两国对等的方针，但实际上认可了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当然的经济上的从属关系。这里也应指出，日本垄断资本的总的意图是在占领中从属于美国，在从属中谋求自己的发展，并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1952年4月和约生效，日本也被解除了占领，这时日本经济和垄断资本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角度很大的变化，但是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

经过若干年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对美国的从属程度也降低了一些。日本要从对美国的从属态势中完全解脱出来，就必须自己握有特别的力量或者形势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之前，也不能说在从属程度上全然没有变化。在日本握有最高权力的美国占领军一旦撤消统治，这对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来说，是从占领军的严格命令中和直接束缚下得到解放。当时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在经济上需要特别处理的问题大体如下：

首先是放弃道奇路线开始执行以来的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针。这个问题，如上所述，不论解除占领与否，都要立即加以解决，然而很快便遇到阻力，结局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又采取了抑制财政膨胀的政策。经过一、二年之后，日本政府还是改变了方针，即不论景气好坏，在财政上都采取积极的预算政策。所以美国的占

领如果继续延长下去，则日本后来的高速增长必定要受到来自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限制。

其次是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交流，特别是日中、日苏贸易问题。在解除占领后，吉田内阁对共产国家仍然继续追随美国的禁止贸易的政策，但在垄断与保守的政治家当中，也不乏强烈要求与苏联恢复邦交，促进日苏贸易往来，重新恢复对中国的贸易的人们，他们同吉田一派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下届政府鸠山内阁继续采取吉田内阁的立场，其方针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旧金山媾和会议虽然没有达到全面讲和的目的，但是作为会议的结果解除占领这件事，还是给日本发展同中、苏的新的经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包括打算与中苏打交道的资本家以及保守的政治家在内，大体上都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国的从属关系。至于政府和垄断资本，它们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也不打算过多地改变其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当时面临美国停止援助、朝鲜停战以及丧失特需这些问题，政府和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反而采取了更加依靠美国以及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方针。首先是极力提倡“日美经济合作”，对此，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都寄予极大的希望。早在朝鲜战火最为炽烈的1951年初，美国便企图动员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其庞大的军火生产计划服务，当时占领军总司令部的言行，曾给予日本当局极大的希望。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美国引进大量资本，以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扩大产业基础。在因朝鲜战争停止而失去特需的情况下，它们希望获得如上所说的“新特需”。然而美国在考察日本工作母机的工艺后，至少是大失所望，它发现日本军火工业的实力极弱。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的军备扩张很快就要减缩，因为这些缘故，与美国重整军备计划相联系的“日美经济合作”不久便消声匿

迹,希望完全落空。

于是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便恳请美国政府继续安排日本提供特需或者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这样,日本便一方面继续从美国得到与越南战争等相联系的新的“特需”,另一方面又接受如后所述的美国 MSA 援助和剩余农产品,并大量吸收外资——美国的私人资本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日本被解除占领之后,在采取与政治和军事方面相适应的经济上的对美从属态势的同时,其在国内关系方面采取的令人瞩目的措施可举出以下几件:首先,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希望在放弃道奇式财政收支综合平衡方案之后,立即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尽可能全部予以废止),并从根本上修改有关工运的各种法规(向坏处修改)。如上所述,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立即部分地实现了。尽管垄断资本顽固地一再谋求更多地宽缓执行禁止垄断法,甚至废除它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主要来自工会、中小企业和一般消费者的强烈反对,终于没有取得成功。后来采取实际上加强垄断资本的方法弥补了这一点。工运法规的修改虽然也受到工会等的猛烈反对,结果还是部分地实行了。如1952年的防止破坏活动法(防破法)和劳动三法^①都部分地作了修改,1953年的罢工限制法(限制煤矿和电力部门的)等,有一部分也作了很坏的修改。后来政府和垄断资本还不断地觅取机会企图全面修改工运法规,但由于工人强烈反对而没有轻易得手。尽管如此,还是从法规以外的方面不断进行效果相同的旨在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

其次,在这一时期还陆续制订了其它一些措施,例如:为促进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而制定的特别租税措施;进一步推动1950年以来实行的重新估价资产的工作;美国停止对日援助后作为财政

^① 劳动三法,即工会法、劳动标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译者

投资资金而设置产业投资特别预算(1953年);在前述作为政府机构的开发银行之外,另行设置专门为设备投资提供资金的两家长期信用银行(1952年)等。

和约生效后不久,日本即加入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也是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1952年),比参加联合国早四年。

还有,从扩大国际市场的目的出发,于1951年开设了日本输出银行(即现在的日本输出入银行)。这家银行作为政府的金融机关,主要为机械、成套设备、船舶等的出口提供长期信贷。接着于1952年公布了出口贸易法(后来改为进出口贸易法),即依靠出口卡特尔等来维持日本出口行业之间的秩序,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也是从1952年开始,政府将加强贸易商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对在战时受害的东南亚各国有赔偿的义务,垄断资本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些地区进行经济扩张活动,对此项工作很感兴趣。这种赔偿工作首先是从缅甸开始的,接着陆续对东南亚各国都进行了赔偿,这一方面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此外,自朝鲜战争以来,日本政府愈益感到必须强调粮食自给。这不仅是出于战时粮食补给的需要,而且还由于,为了扩大出口必须努力增加原材料的进口,因而必须尽量以国内的粮食生产来代替粮食进口。

总之,在解除占领的前后,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的方针和行动并未立即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因为在解除占领之前,特别是在解除占领时的一段时间,日本垄断资本已经陆续提出许多对策,为其发展做了必要的基础准备。

5. 正式引进外资的开始

战后日本历代内阁,包括社会党的内阁在内,都把“引进外资”

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广义的外资之中，作为外国的国家资本输出（外国政府的投资），战后日本已经接受了美国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经济复兴基金的巨额援助；但是引进私人资本即来自外国的私人投资，一直到1950年前半年为止，尚未正式开始。这是因为日本的国内情况还极不安定，而美国的对日方针也不能使美国资本十分安心地拥向日本；此外，日本政府也还没有做好接受外资的准备工作。但是，一般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提供的援助，对以后美国私人资本对日本的扩张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在占领初期，一部分大资本已随美军迅速进入日本。首先进入的是美国的二大石油公司。所以在其它国家的石油资本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的石油工业和石油市场主要被美国资本控制。其次，美国三大银行的资本，也随着美军进驻而进入了日本。

日本于1950年公布了“外资法”。这使日本从法律和制度上摆好了接受外资的态势。正好朝鲜战争在此时爆发，前面已经说过，战争使个别垄断资本获取了庞大的利润，使国家得到了巨额外汇，工业经济也因而急剧地恢复起来。所有这些，迅即使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私人资本掀起对日本投资的热潮。

根据外资法批准引进的外资情况来看，股票投资和借贷投资等外国资金，除1954年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趋于增加。技术援助（这也是外国投资）的合同件数，到1952年为止也急剧增加，但从1953年到1955年这段时间趋于减少。从战争结束到1954年末，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可从第7表上知其概略。在外资法公布前的一个时期，美国政府以援助名义进行的投资已达到庞大的数额，而私人投资在统计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金额。但是进入1950年度以后，政府的投资减少了，私人投资则大量增加了。

虽说如此，这一时期外国公司以技术援助即以提供和转让专利来取得参加经营股份的情况为数还是很多。随后贷款投资大幅

第7表 战后外国资本的对日投资

(1946—1954年度)

(单位: 100万美元)

	1946—1954年度	1950—1954年度
(1)政府投资	1,593	523
(2)私人投资	—	90
股 票	—	32
贷 款	—	58
(1)(2)合计	1,593	613
(3)技术援助合同批准件数	—	446

(备考) 据大藏省发表的资料制成。

度增加,几乎取代了援助投资。但从外国流入的实际资金还不多。

尽管外国的投资还不多,但已出现以下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如综合地考察技术援助、股票投资和贷款投资这三种主要的私人投资形态,可以看到,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石油、机械(包括电气机械)、化学和电力这四个部门。外国资本此时已经深入到日本的各个主要工业部门,这些工业部门的重要装备都与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实际上,这种急剧变化是在短期内发生的。

日本政府此时在引进外资方面特别着力于取得世界银行的借款。世银的借款后来虽然也用于其它各个重要工业部门,但这一时期首先是为建设火力发电厂而向中部、关西、九州三家电力公司提供“火力借款”,总数为四千零二十万美元,借款合同于1953年达成协议。主要条件是:“日本国”要充当保证人,要以国家的全部财产做担保,并规定世银借款在日本的一切法律中均处于优先地位,而且世银有权干预各电力公司的收费标准等等。以上各点,在日本国会上都被作为重大问题来处理。

尽管当时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特别希望私人资本和美国企业直接进入日本,但是在日本引进的外资中,美国资本的直接投资还是不多,最多的是技术援助。正如美国商务部所指出的那样,此中

原因之一乃是日本资本害怕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国内，害怕外国资本夺取它们的经营权和它们的企业。此外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从当时的状况来说，美国还未感到日本象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那样具有魅力，还不值得美国认真地进行投资。这个问题，与日本对外资依赖态势的强弱，一般地说是两回事。而且在经济上的从属程度如何，也不能单纯以外国投资金额的大小来判断。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进一步阐述。

6. 依赖特需与MSA体制(安全保障体制)

由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金额每年都很庞大，日本的外汇收入也随之急剧增加。到1954年为止，外汇总额已达约三十亿美元，其中外国的汇款收入占30%。特需既为日本创造了巨额的外汇，又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收支。但特需原本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需求，因此从1953年停战以来大幅度减少，预计将来还要减少，因此人们愈益感到不安。如上所述，特需既有与通常的出口相同的一面，也有促使国内物价水平上升的一面。

美国以特需使日本出口得到增长为由，于1951年7月开始停止对日本的援助。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预计到特需将随战争的停止而停止，即使不停止，也要大幅度减少，但是一旦停止，仍不免惊慌失措。

正当这个时候，美国同日本缔结了MSA协定(相互保障安全协定)。此时，日本已经得知美国不再提供经济援助，但政府和垄断资本还是抓住这个协定向人民宣传美国似乎将继续给予经济援助。MSA协定已于1954年3月签署，但是日本并没有由此得到经济援助。为了多少做点弥补工作，日美才以MSA协定为基础缔结了MSA小麦协定，日本勉强得到五千万美元剩余农产品的援助，并将其出售所得的一部分用做财政投资，以此来掩饰它们夸

大宣传的错误。但是在选择贷款对象时，日美之间的意见很不一致，双方长期争执不休。

接着，根据美国剩余农业品处理法，日本于1954年11月和1956年2月分别接受了一亿美元和七千万美元的剩余农产品的援助。这些农产品出售后的收入，一部分用做日本政府的财政资金，表明政府具有依赖这种援助的倾向。但另一方面，接受剩余农产品也在国内引起了很多纠纷，以致政府与垄断资本受到了种种批评。

总之，特需在每况愈下，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不安，于是它们求助于一种新的体制，即MSA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日本虽说取得了独立，但不论从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方面来看，都没有从依赖美国的从属体制下解脱出来。

7. 从危机到回升

从1953年的“虚假繁荣”（见1954年《经济白皮书》）到实行紧缩政策、制订“一万亿日元预算”的1954年，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口都急剧地增加了。“特别是从失业方面来看，其数量已超过道奇路线时期，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紧缩政策使社会的不安逐渐增加，已经发展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资料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见《战后经济史》总观篇，第576页）。

生产过剩危机引起物价下跌，1954年度年中物价下跌4.5%，基本上跌到了预期的程度。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景气开始好转，已经恶化的美国经济也在这年的秋季出现回升。包括一部分倾销在内，日本的出口开始增加，大量的积压物资趋于减少。出口增加，促使生产从秋季开始回升，吃紧的银根也逐渐缓和。已被大幅度削减的预算，由于上年度结转下来的金额较多，也意外地增加了，加上地方财政预算增加等原因，严重的紧缩后果消失。

1953年发生了“保全经济会”的贪污事件（一个假的金融行业——保全经济会，向保守党干部大量行贿的事件），接着在1954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造船贪污事件（造船公司干部、自由党干部、运输省^①官僚，围绕着分配造船贷款、为制定造船利息补助法提供的政治献金等而发生的行贿受贿事件。预定要逮捕的佐藤现国务大臣，由于法务大臣使用了指挥权而免遭逮捕；预定要逮捕的现首相池田，也未逮捕而结案）。国民对吉田内阁极为不满，保守阵营内部斗争激烈，吉田内阁陷入危机。尽管景气趋于回升，吉田内阁仍在此时失去垄断资本的支持，终于在1954年12月以任职六年而下台。与东西方一时出现的紧张缓和相对照，吉田内阁的崩溃与其片面执行依赖美国的方针，特别是在经济上对MSA体制在经济上过份期待的破产，看来不无关系。

^① 运输省即运输部，是日本主管水陆运输、港湾、船舶、铁道等的中央行政机关。——译者